

《中山文艺家评传》丛书 胡波 主编

阮章竞评传



陈培浩 阮援朝 著

漓江出版社

《中山文艺家评传》丛书 胡波 主编

阮章竞评传



陈培浩
阮援朝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阮章竞评传/陈培浩,阮援朝 著. —桂林:漓江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407-6322-0

I. ①阮… II. ①陈… ②阮… III. ①阮章竞(1914~2000) — 评传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4132 号

组 稿:张玉琴

责任编辑:张玉琴 赵建培

装帧设计:星 星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833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山东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华路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1.75 字数:22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5.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9-2925888)

《中山文艺家评传》丛书

总策划:唐 颖

策 划:陈 旭 胡 波

编委会:(按姓氏笔画排序)

于庆华 王 莉 李正思 李英中 李容焕 宁 全 陈 远

吴竞龙 郑 胜 胡三白 黎泳芳 侯兆松 黄衍增 谭文卿

黎柱成 欧阳健平

主 编:胡 波

副主编:谭文卿 冯福祿

编 辑:陈国庆 黄雪春 周雅怡 赵 军

《中山文艺家评传》丛书

总序

胡 波

凡是对过去的历史稍有兴趣的人,都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无论是研究历史还是审视现实,杰出人物和重大事件总是遮挡着我们的视线,影响着我们的思维和判断;全部历史的真实或社会生活的全貌,总是被杰出人物的作用和重大事件的影响所遮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本身具有地域特色而又丰富多彩的香山文化,就因岭南文化的定格和孙中山的声名而湮没,以致长期以来岭南文化覆盖了香山文化,孙中山研究替代了香山名人研究。这种“抓大放小”,“目光向上”的价值取向和思维定势,既不利于深化和拓展人们对中山名人文化的认识 and 了解,又不利于本土香山文化的传承和创新。

柏格森的老师蒲陀罗曾告诫梁启超:“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它,而且叫它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它总有它的特质,把它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生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这席话使梁启超茅塞顿开:既然很浅薄的文明,只要发挥出来就都是好的,更何况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呢?因此他觉得“对不起祖宗”,因为“先秦诸哲、隋唐诸师,它不都是我们仁慈圣善的祖宗积得好几大宗遗产给我们吗?我们不肖,不曾享用,如今倒要闹学问饥荒了”。于是从欧洲游历归来后,决定放弃曾经热衷的政治活动,而全力从事于培植国民实际基础的教育事业,讲学著书,以培养人才、挖掘中国文化、传播新知为要务。

今天,像梁启超这样先知先觉,能知能行的大师毕竟凤毛麟角,而且事实

上也不可能个个都像梁启超那样大彻大悟,做学术研究的大师,成一代文化名家。但是,传承文化,再造文明,毕竟是历史的呼唤和时代的要求,因而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珠江三角洲上的中山,虽然建县的历史不算久(到今年恰好是 860 年),但中山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也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尤其是在近现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变革时期,这里不仅诞生了一代伟人孙中山,涌现出了一大批像唐廷枢、徐润、郑观应、马应彪、郭乐、郭泉、蔡昌、蔡兴、李敏周、刘锡基这样的实业家,而且还孕育和造就了像容闳、王云五、钟荣光、苏曼殊、阮玲玉、郑君里、萧友梅、吕文成、张慧冲、郑志声、郑景康、特伟、方人定、古元、阮章竞、黄苗子、方成、萧淑芳、唐滌生等一大批具有深远影响的文化名家,他们不仅是中山人的骄傲,而且也创造了一座座香山文化的丰碑。他们的思想理论、艺术作品、精神品格,无疑也是中山人的宝贵财富和精神动力。

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这些与中山血脉相连的文化名家和实业家的认识与了解,既不深入也不全面,始终停留在生平事功的介绍和作品述评的层次上,对他们一直缺乏群体的历史研究和整体的文化分析。近年来中山学术界虽然开启了香山买办、香山商帮和香山文化的研究,编辑和出版了《风起伶仃洋——香山人物谱》、《香山星座》、《名家说艺》、《岭南画派与中山》、《文艺作品中的百年中山社会》、《艺境的追寻》、《北上北上——中山人在京津唐》、《创意与创新:中山创新文化的历史审视》,但文化和文艺名家的研究一直徘徊不前。与中山血脉相连的文化和文艺名家的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以及他们在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与影响,依然没有得到充分的历史评述和学术考量。

庆幸的是,文化名家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为,大大地弥补了文艺名家研究的缺失。著名漫画家方成先生的《漫画老乡》一文,既为中山漫画名家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又为中山名人文化的挖掘提供了思想的启迪。他在文中写道:

在籍贯栏里我都填的是“广东中山”。我童年确是在中山市(那时是香山县)南朗左步村(那时叫“左埗头”村)度过的。在家里也从父(当时是从母)说一口闽语系的南朗乡音。曾听我妈说,我

出生是在北京,按洋规矩算是北京人了。可耳听不如眼见,我见到的家是在广东乡下,小朋友和邻居都是说南朗话,姥姥家也不远,说的还是南朗话。9岁到北京上小学、中学,自然要说北京话了,可在家里依然从父说南朗话。又因性相近,总和广东人相处,中山城里的话和广州话我都会说。因此,我按中国习惯只承认是广东人;尤其是中山人。我作画用的闲章刻的就是“中山郎”。我向往中山,还因为中山市是革命先锋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我和他还沾点亲。而且,著名电影明星阮玲玉还和我同是左步村小同乡,两家离得很近。俗人好高攀,我自难免,能攀上几位名人,自我感觉光荣的。后来又发现中山更可爱了:看中国美术家协会里面,中山籍的漫画会员真多,人数在全国恐怕占第一位。老一代的有黄苗子和特伟(原名盛松)。还有早已去世的女漫画家梁白波也是中山人。《中国漫画史》中有她的名字,年纪轻些的是江有生和我。五十多岁的有方唐(原名陈树斌)。除此之外,有个后补的我家老三孙晓纲,他还不是全国美协会员,但不久就有合格申请加入的希望了。广东靠海,和外国沟通,受现代文明影响最早。现代漫画传进来,在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时期,宣统皇帝还没下台,广东就出了个反封建的漫画家何剑士,也是中国漫画史上有名的。

难能可贵的是,方成先生在如数家珍地介绍中山籍漫画家的生平和事功的同时,还对漫画家集中出现在中山的现象提出了疑问:“广东地方这么大,画漫画的人却集中地出在中山;更怪的是这些人才都是少小离家的,中山风水浸润并不多。”其实,方成先生的疑问,也是多数香山文化研究者的发现和思考。为什么这些“少小离家的,中山风水浸润并不多”的祖籍中山人,像孙中山年轻时离家出走,到海外发动革命一样,在异地他乡竟能干出一番事业,并能成名成家,是中山这里舞台太小还是这里水土风物和历史文化独特?中国和广东这么大,为什么唯独中山这里盛产文化名家和艺术大师,是历史的巧合还是自然天成?为什么像方成、黄苗子等文艺名家总是不忘自己的祖居地,总是喜欢自称“中山郎”,是乡土情结的纠缠还是景仰中山先生的情怀使然?这些虽然一直是中山人和香山文化爱好者们思考与需要回答的

问题,但是事实上过去的思考和解释并不令人满意。

有趣的是,早在上个世纪初,刘师培、王国维、汪辟疆、梁启超、丁文江、潘光旦等就注意到人才和地理分布、人才成长与地理环境等问题,并作过统计学、社会学和文化地理学方面的分析研究,其中梁启超的《地理与文明之关系》与《近世学风之地理分布》,丁文江的《中国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陈寅恪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刘师培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汪辟疆的《近代诗派与地域》等,就对人才尤其是文学人才的成长、分布与地域或地理之间的相互关系做过历史的研究和理论的分析。尤其是潘光旦先生对人才问题的研究和看法,就颇耐人寻味。他说:

人才的问题很复杂,因缘当然也很多,但归纳起来,总不出地理、生物、文化三种。可惜以前注意人才问题的人,不肯就这种常识的见地,再做进一步的推敲,因而发现地理、生物、文化三种因素究竟和人才的产生有什么关系。他们不走这条平坦的路,而偏欢迎许多出乎情理以外的解释。就地理一个因素说,在缺乏智识的人手里,变做风水的宗教,在有见识的人手里,变做“天地钟灵,山川毓秀”的玄学。生物的因素,变而为阴鸷论,变而为胎教论,变而为后天获得性遗传论。文化一因素算是最没用受曲解,但一壁有人过于看重教育,深信孟子所谓“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一类的话,一壁也有人把“文风”“学风”这种东西说得十分神秘,令人“兴不知吹从何处来,吹向何处去之感”。

显然,在潘光旦看来,地理、生物、文化这三种因素缺一不可,不能彼此分割或片面地夸大。他本人则注重地理,尤其是看重地理环境的不齐所唤起的迁徙的作用。他也注重生物的因素,尤其是才性遗传的那一部分。他更充分承认文化熏陶与浸润的力量,认为文化积累得越多,此种力量便越大。潘光旦先生对人才产生的看法,也可作为我们研究中山文化名人的借鉴和参考。

但是,近三十年来,人们更多地是从地理环境和地域文化的角度,探讨文学和文学人才的产生、形成及其特点。曾大兴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梅新林的《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李浩敏的《唐代三大地域文学士族研

究》，戴伟华的《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陈建华的《十四至十七世纪中国江浙地区社会意识与文学》，胡阿祥的《魏晋本土文学地理研究》，徐永明的《元代至明初婺州作家群研究》，韩结根的《明代徽州文学研究》，王学泰的《以地域分野的明初诗歌派别论》，蒋寅的《清代诗学与地域文学传统的建构》，杨义的《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都从地域文化、地理环境与文艺人才分布和文艺创作风格之间的相互影响的角度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袁行霈在《中国文学概论》中甚至专门辟有《中国文学的地域性与文学家的地理分布》一章。这些虽然不是近年来国内文学地理学和人才地理学的研究成果的全部，但基本上代表了新时期文学研究的新方向、新观点、新方法和新成果。尤其是年轻学者杨念群试图借用新的方法，把思想史与社会史加以沟通，通过儒学从官方的意识形态转化为民间的思想资源这一复杂的过程，比较全面地展示了江浙、广东和湖南三地不同的儒学形态对近代知识分子言行的影响。他的关于近代中国儒学地域化的研究，就在事实上肯定了地域文化对知识群体的产生、形成、思想、行为以及地位和作用等的影响。

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大变革大转型时期，中山这个土地并不辽阔的地方，却是人才辈出，群星璀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均涌现出一批开风气之先的名人名家，尤其是在美术、音乐、电影、戏剧、摄影、文学等艺术领域，产生了一批具有深远影响的艺术家。但是，他们当中有的少小离家，在外面的世界演绎了自己精彩的人生，故乡中山（香山）只是生命中一段难忘的记忆；有的生在他乡，甚至根本就未曾回过祖居地中山，中山对于他们来说，仅仅是一种历史的追寻和文化的想象。因此，如何界定他们与中山的关系，是否将他们纳入中山名人文化和文化名人研究的范围，就成为当代中山学术研究的重要课题。

其实，无论是生在中山、长在中山又成名于中山的文化名人，还是祖籍中山而生长在异地他乡的文艺名家，他们都与中山的地理与人文有着血脉相连的关系，就像方成先生所说的那样，在外面说北京话，在家说南朗话，按中国的习惯称自己是广东人或中山人，在情感上和文化上还与中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这些在中山之外成名成家的文化名人，理应成为香山文化和中山文化的研究对象。《中山文艺家评传》丛书的策划、编撰和出版，就是为了挖掘和保护中山的历史文化，弥补中山文艺和文艺名家研究的缺失，丰富

香山文化和中山文化的内涵,推动中山社会和城市文化的建设,增强文化的软实力和城市的综合竞争力。

《中山文艺家评传》丛书,主要选择中山籍或祖籍中山的文艺家作为评传的对象,着重对文艺家的作品创作、艺术贡献、生平事迹和精神品格展开历史评述,而不是全景式的人物传记。过去虽然也有关于苏曼殊、阮玲玉、萧友梅、方人定、黄苗子、古元、唐涤生等人的传记,但有的只是生平事迹的编年或排列,“传”压挤着“评”,传主的人品风采、性格灵魂,反而被大量罗列的事实遮蔽起来;有的只是一篇传记加上若干专题评论,“评”和“传”被撕成两张皮,彼此缺乏必要的联系;有的在评论传主的某一具体业绩或过失时头头是道,甚至切中肯綮,但却疏于对传主人格和历史地位的总体评判;有的在“评”和“传”中仅仅满足于就事论事,知人论世,但却忽视了传主生活的年代和所属的文化对传主思想观念、创作手法、主题内容、表现形式及艺术风格等的作用与影响;有的在“评”和“传”上过多地掺杂了自己的价值观与审美趣味,甚至个人感情,在评判和叙述时,总是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和想象的成分,因此难以深入全面、科学客观地实现历史还原。

《中山文艺家评传》丛书,力求摆脱琐碎繁杂的“事实”纠缠,着重于揭示传主的思想、气质、人品、个性形成的原因及对其艺术人生的影响;力求在广阔的历史进程和个人生活环境的双重背景上,对传主的每一阶段作出深入的历史和社会的文化阐释与学理评析,着重于在“传”与“评”的有机结合中,描画出和历史进程息息相关的传主动态的生命进程;力求在事实判断、价值判断、道德判断和审美判断中,把握“传”与“评”的分寸,掌握人物评价和艺术评判的尺度,着重于主观与客观的有机统一;力求叙事和评说取材丰富、断制严谨、文字简洁、平实晓畅、有血有肉、生动感人,着重于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追求学术性、史料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努力使每一部文艺家评传,都是一件晶莹剔透的艺术品,都是一部香山文化的精品力作。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这套丛书的出版,既是对中山历史文化资源的一次深度挖掘和整理,更是一次对中山城市人文精神的弘扬和重塑。

2012年12月

序

王光明

三年前吧，诗人阮章竞的女公子阮援朝女士寄来了《晚号集》和《阮章竞绘画篆刻选》。阮章竞是解放区的重要诗人，他的代表作《漳河水》是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作品。未曾想到他还擅长美术与金石，更未曾留意他少年时是油漆店的学徒。

《阮章竞绘画篆刻选》由著名版画家彦涵作序，他认为阮章竞的绘画以写生为基础，在笔法上融汇中西：在中国画中接纳一些西洋画的因素，而在彩棒画中融入中国画的笔法。我是绘画金石的门外汉，读画时更感兴趣的是色彩、线条体现出来的诗意，以及他用墨的浓淡来表现无形的感觉和有形体积的意趣。还有一点非常让我好奇：阮章竞有意趣的画大都作于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而这正是他诗歌作品的情趣趋于寡淡之时。

那时阮章竞的诗的题材大多是革命历史与现实，而绘画大多以山水、风情风物为对象。为什么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画，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诗人的才情与意趣？

由于独特的历史语境，当代许多重要的诗人其实都有我们未曾注意到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当援朝女士去年来电话，希望与我们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合作，整理和研究阮章竞的创作时，我当即想起了刚入学的培浩。一来，阮章竞的原籍是广东中山，同为广东人的培浩有“义务”、也有较多条件去从事这项工作；第二，培浩考上博士前已经在地方大学工作，研究诗歌多年并出版过诗歌批评著作，较能胜任。

培浩很愉快地接受了这项工作。如今不到一年，就有《阮章竞评传》的

成果出版,真让人喜出望外。这应该是教育、研究机构与研究对象亲属之间进行合作的一个成功尝试吧?培浩告诉我,作为传主亲人的阮援朝女士,不仅提供了大量材料,对许多问题有很好的见解,而且她坚持不以亲人的感情和观点影响学术研究的见解,尊重真实、客观的历史描述。培浩说,由于“容易和阮援朝老师在不断沟通中达成一致”,因而能够在历史语境中叙述、评价传主的成就与局限。

评传写作,某种意义上是一种还原术。不仅要“还原”历史人物所经历过的人生,还要通过他的人生历程“还原”其思想、性情和精神风貌。实际上,大凡有价值的传记,定然是传主灵魂与精神的肖像,又是传记作者心灵的回声。诚如法国新传记作家莫洛亚所言,须是“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的园地——不论对于任何问题,都要自己去探讨,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结果”。所谓“学者的理智打进了心理学和伦理学”,“并且接受自己的研究结果”,意思大抵是传记作者要以自己对传主的深入研究作基础,但又必须把研究心得转化为对传主的心理世界和人格魅力的鲜活感受,才能赋予传主灵魂与血肉。当然,这样的传记不光是“研究”出来的,也不光是“写”出来的,而且是体验和憬悟出来的,是一个生命拥抱另一个生命,一个心灵神交另一个心灵的结果。

阮章竞生活在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时代,革命将一个油漆店的学徒变成了出色的诗人和文艺界的领导,无论他的生活、恋爱、工作、交往,都有许多不寻常的东西可记可叙。但《阮章竞评传》不猎奇,不从众,而是认认真真从时代读传主,又从传主看时代,努力通过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折射一个时代的明暗,写出了属于、处于那个大时代的诗人的身不由己和自觉坚持,揭示了在“伟大”中追求平凡人生的意义。

《阮章竞评传》的第一个贡献,是以独家的材料,全面展现了一个文学家在近一个世纪生命历程中的人生选择、文学创造、独特性格乃至灵魂秘密。每个文学家都是文学史拼图中的一角,都有其自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对每一棵树的讲述,都有助于理解森林、解释森林。很多有影响的文学家并未留下传记,因为他们的材料没有遇到有缘人,丢失了,更兼同代好友纷纷谢世,便失去了将其人生细节完整讲述的机会。阮援朝女士作为阮章竞先生的亲人,同时也是个有心人,她将阮先生的大量手稿、笔记都完好保存,这些材料

为传记的写作助力不少。比如,传记谈到阮章竞七十年代末的焦灼心境,那种具体性如果没有笔记材料的支撑,是不可想象的。更难得的是,两位作者并不止步于自有材料,还采访了跟传主有接触的很多人,作了大量口述材料,使传主人生有了更加丰富的细节。

由于有了丰富细节,某些未曾被看见的东西也开始被呈现。近年来,我们对于1949年走进新时代之后的文人灵魂转折,有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我们看到沈从文的转向,看到穆旦1958年短暂重现之后的噤声,看到被批判的胡风……我们看到很多被排斥者的故事,可是,那些批判的实施者,很多也是文化人,他们又是何种心态呢?本书通过梳理在中国作协工作时期的阮章竞隐秘的内心体验,揭示一个令人意外却又并不奇怪的事实:作为作协党总支书记的阮章竞,也在受着难言的煎熬。“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为我。”(约翰·多恩)对于一个极端的年代而言,也许真的没有胜利者。因此,阮章竞旋涡中的逃离,显然是一种无奈的智慧,一份守护诗心的努力了。

同时,《阮章竞评传》还是一部有较自觉问题意识的传记。“评传”并不仅是讲故事,还必须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去触及问题,并提出自己的思考。本书第三章写到太行时期的阮章竞,显然就试图通过阮章竞这一个案,把握解放区剧团写作的性质;通过阮章竞经历的“大戏风波”,理解解放区的文学边界的建构过程;通过阮章竞亲身体验的太行党校“整风”,解释解放区文人个体人格跟革命体制之间强烈摩擦中自我生成的过程。第十四章触及了诗人阮章竞的另一层身份——画家,作者并没有遵循常规思路,去阐释阮章竞绘画、篆刻在美术艺术上的重要价值——或许这方面并非两位作者所长——但他们的另一层问题意识却令我颇感兴趣:作者从诗画的关系进入,发现六十年代以后,阮章竞先生的诗画问题作品,体现的不是诗画相生,而是诗画分离。在特殊的政治环境下,作为职业文学家的阮章竞的写作没有逃脱政治的宰制,但是,他的诗心和性灵却转移到了绘画领域。这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我上面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画,让我们重新看见一个诗人的才情与意趣?”这大概是一个关乎十七年文学制度和想象,关乎作家心灵如何在规约中逃脱的故事吧。我认为此书提供的个案,对我们重新

进入十七年文学“中心作家”的精神世界,理解这类作品内心的丰富性,是有启发的。

作为一部诗人传记,本书自然也必须对阮章竞先生的作品作出评价。作者较为准确地把握了阮先生代表作《漳河水》的艺术开创性,从民歌体的历史脉络中审视《漳河水》的继承和突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还注意到阮章竞作为戏剧家的审美经验对长篇叙事诗《漳河水》的影响,认为,多重对照的戏剧结构的引入是此诗艺术上成功的重要保障。这一立论,既是新颖的,也是有说服力的。作者还希望以历史的同情的态度,在五十年代工业诗歌的写作风气中,把握《白云鄂博交响诗》的宏大美学野心和在诸多限制下的失败,对于作品的分析虽然尚可更深入,但这种试图把握社会主义时代诗歌的复杂性、丰富性的态度和努力已令人印象深刻。

显然,作为一部深入到某些时代症结和传主灵魂的诗人评传,《阮章竞评传》不仅对于当代中国文学史的教学和研究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而且对于认识诗人与时代的纠缠迎拒关系,提供了一个值得重视的个案。

2012年11月7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故乡岁月故园情(1914—1934) /1

寒门子弟行路难 /3

学徒漆工画家梦 /6

故乡中山、人生选择与故园情结 /12

第二章 闯荡大上海(1934—1937) /19

初临都会 惊诧莫名 /21

求知若渴的底层青年 /24

立信歌咏班 结识冼星海 /27

第三章 风雨太行山(1938—1949) /35

欲济无舟楫 报国向太行 /37

战火中的剧团写作 /41

演出风波和解放区文艺体制的边界 /57
翻身道情:题材规约和解放区文学的“新”与“真” /65
阮章竞的整风记忆和革命的心灵辩证法 /71

第四章 《漳河水》:民歌体叙事长诗的巅峰之作 /85
《漳河水》:多重对照、总分交叉的戏剧结构 /87
《漳河水》:对民歌体叙事诗的继承和超越 /91
《漳河水》对几个艺术难题的解决 /94
“集体创作,是违背艺术规律的” /100

第五章 华北局:革命胜利的喜悦(1949—1954) /103
春风得意马蹄疾 /105
在文艺处:“屁滚尿流,屁滚尿流!” /109
《在时代的列车上》,在时代的列车外 /114

第六章 中国作协:漩涡中的逃离(1954—1956) /119
阮章竞在作协的起始时间 /121
从驻会作家到党总支书记 /123
“总是失约”和“拖着未办”之间的体验 /129

第七章 童话诗《金色的海螺》等 /137
五十年代的儿童文学热 /139
《金色的海螺》:童话诗背后的现实批判 /140
《马猴祖先的故事》和《牛仔王》等 /145

第八章 在包钢:到塞外去,到民间去(1957—1960) /151
激情歌唱重开腔 /153
塞外频采风 喜到群众中 /160
隐忧和归京 /163

第九章	《白云鄂博交响诗》:寻找工业叙事诗的新可能	/171
	阮章竞谈《白云鄂博交响诗》	/173
	当代学者谈《白云鄂博交响诗》	/176
	《白云鄂博交响诗》:雄浑与粗疏之间的撕裂	/178
第十章	战战兢兢的《诗刊》副主编(1960—1962)	/185
	阮章竞到《诗刊》:一个折中的结果?	/187
	“事大事小,都由我负责”	/190
	“谁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192
	疲倦与离开	/196
第十一章	新华北局:台风眼里的写作空间(1962—1967)	/201
	专事创作的副秘书长	/203
	“文革”来了:接待红卫兵和抄写大字报	/205
	寻找新的精神空间	/209
第十二章	河北省革委:荒唐岁月里的老阮同志(1968—1975)	/213
	文教组常请客的“老阮”	/215
	“老阮考虑问题比较深刻”	/216
	文教组老阮的“三重门”	/218
第十三章	从“可怕的压力”到归来的晚号(1975—2000)	/223
	《海河行》争论:“文革”文艺生态的余震与伤害	/225
	归来的反思	/229
	《霜天》:萦绕终生的抗日记忆和家国情怀	/235
	散文、编书和回忆录中的新旧岁月	/241
	诗的执著:短诗和长诗	/247
	《晚号》为何寂寞?	/257